



张德福近影

心怀祖国 戍边疆

环境艰苦 绝不退缩

1957年12月,17岁的我心怀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应征入伍,在部队训练一个月后沿青藏公路入藏。1958年,当部队抵达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时,发现那里地广人稀,物资匮乏。尽管年轻,可我还是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当雄县,走路一直喘着粗气,吃不下饭。大家住在铁皮房里,一个班12人共同挤在木板床上睡觉,依靠牛粪生火,食物只有干菜和夹生饭。

意外绕路 躲过埋伏

1959年3月,我军和敌对分子在拉萨市连战三天三夜,最终取得胜利,敌人只能向西藏各处分散逃亡。敌人虽遭到重挫,可没有完全放弃,威胁当地老百姓加入他们的队伍,如果得知老百姓给解放军带过路,则要将其杀害。为了祖国和平和老百姓的平安,我们必须剿灭这股猖狂的残余敌对势力。因为交通不便,部队只能依赖牦牛、马匹运输大宗物资,每个战士平均负重35至40公斤前行。5月,我营计划前往旁多(旧宗名,后并入林周县),请一名老百姓带路。该消息传到了敌人的耳中,他们便提前埋伏在行进道路四周。

连夜作战 大获全胜

1960年夏天,部队得到情报,敌人集结了1000多兵力在纳木措。我们迅速响应,连夜赶到当地,作战计划是分散兵力,通过合围的方式将敌人困住。这是一个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敌人靠近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们摸黑进行猛烈攻击。敌人作战凶狠,尤其是在近距离攻击时,手持长刀下足狠劲朝我军乱砍。由于我军计划周密,军力充足,他们要想突围,如天方夜谭。经过一夜炮火轰击,快天亮时,双方局势明朗。敌人终究是敌不过,除了少数几人,大多倒下。除了武器,我们将缴获的牦牛、马匹全部还给了当地老百姓。就地休整一天后,我们得知纳木

措当时拥有西藏地区唯一的机场,是部队运输物资的重要空中通道。彼时形势已非常紧张,而我作为当雄警卫营的一名机枪手,责任重大。我们在狂风肆虐、大雪纷飞的天上下轮班站岗,一站就是整晚。时间久了,有个别同志难免打起退堂鼓,可我想,西藏条件再艰难,又哪能比得过红军万里长征?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必须以坚强不屈的意志,面对现实环境。

前往旁多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是绵绵高山,原本路程仅1天,但因为那名老百姓带错了路,我们走了足足一天一夜才抵达。事后想来,我们正是因为绕路远行,才阴差阳错避开了敌军的袭击。抵达旁多的当天夜晚,敌人已将简易搭建的木板桥损坏。我军隔着河流,往对岸开火。因我有重炮和重机枪,敌人眼看打不过便向远处逃跑。我军立即使用牛皮船渡河,由于物资过重,渡河任务十分不易。渡河之后,我们紧紧追击敌人,直抵林周县。敌人总是想方设法偷袭我军,但我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让敌方计划始终未能得逞。

措一战的残兵败将向北逃窜,于是又赶紧追击。当抵达当地人称为“过皂”的地方,发现敌人在此无法上山,只能在山沟徘徊。我们用火力堵住出口,对敌实行军事打击结合政治争取的策略。战斗仅用两个多小时,我军大获全胜,我也击毙了不少敌人。我们收缴了近80头牦牛,全部归还老百姓。这是我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作战经历。作战即是如此,我们每次行动如果追得太远,就会饱受饥渴之苦。在等待飞机空投物资到来以前,我们经常无米下咽,只能靠喝些冷水维持生命,而水有时也是稀缺资源。终于等到物资到来,有些战友一口气连吃七八碗饭,我也吃了四碗。当时重度疲倦的我们,不到一分钟就进入了梦乡。

口述 张德福

整理 记者 唐诗敏 文/图

人物

张德福,1940年12月出生于四川仁寿。1957年12月入伍,196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乐山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副师级,曾参加西藏平叛战役,荣立三等功1次。



在西藏从军时的张德福

受访者供图

漫天风雪 极限体验

1960年,那曲军分区组建。我们全连调往那曲,并改为特务连。我在侦查班当班长,跟着司令员走访检查平叛工作。

那曲海拔高,条件艰苦。记得有一次部队通报,要求战士们在行军过程中必须下山之后才能休息,我这才知晓翻越雪山的艰辛。有支队伍好不容易穿越风雪,攀上了雪山顶峰。可战士们太疲倦了,他们本想在山顶休息片刻,却不料身躯被完全冻住,成为雪山永恒的丰碑。

我在那曲待了33年,从一个小班长一直到副司令。我和很多战士一样,觉得比起扛枪打仗,大家面临的更大考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当地流传着一支民谣:“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我们常常在极寒天气下席地而睡,漫天风雪覆盖了全身,次日醒来,只有两个鼻孔还在冒热气,真的非常苦。

军人之家 感怀党恩

1964年,我和妻子结婚,此后三个女儿陆续出生。由于工作原因,我们夫妻俩长期留藏区,孩子们只能由内地的保育院代为抚养。等到她们年岁渐长,又纷纷前往“八一”学校念书。那时,每隔三年我才有一次假期,长久的分离,很多孩子甚至无法认出自己的父母。很幸运,我女儿总是能记住父母的模样。

“爸妈不能待在身边,你们只能从小靠自己。这辈子要好好做人,报效祖国。”每次见到孩子,我都跟她们叮叮万嘱咐,希望她们能成为有用之人。

而今我已82岁高龄,我的女儿们也不再年轻,但她们令我骄傲。大女儿勤奋读书,考取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曾在西藏旅游局任职;二女儿和三女儿都主动提出要部队锻炼,光荣入伍。部队纪律严明,训练艰苦,但她们都坚持下来,未曾退缩。二女儿甚至还在军营中找到了相伴一生的爱人。我的外甥也一样,是一名优秀的军人。

作为一个“军人之家”的家长,回顾几十年从军生涯,党组织对我关怀备至,悉心培养,使我成长为一名吃苦耐劳、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我内心充满感激。虽然已经退休27年,但我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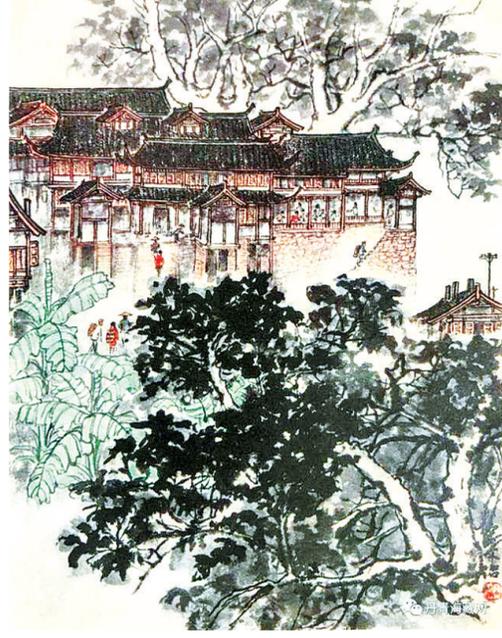


军人之家(第一排左起:张德福和夫人;第二排左起:张德福二女婿、外甥、二女儿) 受访者供图

画家笔下的峨眉山

宋文治

峨眉山麓新景象



宋文治《峨眉山麓》

(资料图片)

郭明兴

宋文治(1919-1999),江苏太仓人。曾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美协理事、江苏省美协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

1960年9月,江苏省国画院由傅抱石院长率队,一行13人组团赴国内各地旅行访问写生,途经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六省十多个城市,历时三个月,这就是著名的“二万三千里写生生活”。在这个写生团里,宋文治担任后勤总管,负责整个行动计划、对外联系和食宿安排等事宜。每天他不仅要做好团队服务,还得沿途体验、写生创作,并协助院长抓作品的观摩交流,任务繁重而艰巨。然而,宋文治在活动中勇当先锋,克服重重困难,既圆满完成了团队服务,还利用自己的笔墨创作了一批佳作,如《山川巨变》《峨眉山麓》《嘉陵江上》《红岩》《广州造船厂》等。

时代的变革,给中国画创新带来巨大动力。傅抱石也提出“思想变了,笔墨不得不变”的见解,给画家们极大鼓舞。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深入到生活中去,边走边画、边访问、边观摩,在中国画创新之路上进行了成功尝试与大胆探索。

《峨眉山麓》一画,是宋文治“二万三千里写生”的作品,最初名为《峨眉山公社食堂》,这是作者运用传统技法描绘峨眉山风光和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代表作。

画面展现的是峨眉山上某公社食堂里社员们忙碌的景象,整个画面结构布局合理,主体景物突出,笔苍墨润,彩墨相间,层次分明,意境浓郁,作者在点面结合、氛围营造上也有一番功夫。画面上丰富的笔墨语言,促成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无愧是国画大家精心描绘的一幅气韵生动的山水画。

1961年5月,江苏省国画院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山河新貌”汇报展,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新金陵画派”也因此奠定了在全国美术界的地位。宋文治创作的《峨眉山麓》等几件作品也入选参展,获得书画界名家一致好评,作品还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和《美术》杂志发表,宋文治也因其出色的作品脱颖而出,一跃而为“新金陵画派”的中坚力量。

盖碗茶

打开城市的另一面

笃鲜

五一假期将至,来一场原地旅行如何?近年来,“citywalk”这种旅行方式传入国内,吸引了一些人尤其是年轻群体参与其中,真正像一个本地人那样感知城市。

citywalk的字面意思是城市行走,也有人将其意译为城市微旅行,或者将其与城市考古联系起来。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拍照打卡式旅游,也并非毫无目的地在街头漫游闲逛,它强调与城市的深度交流——在大众化的旅游景点之外,还有更多不甚出名却颇有来历的旧址故居;在千城一面的小吃街之外,还有更多散落在城市角落的特色美食;在现代都市的水泥森林之外,还有更多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的街坊里巷。行走的过程,就是在用脚步丈量一个城市历史的厚度,用双眼拆解它的发展脉络、人文底蕴和审美价值,最终在头脑中构建起个性化的城市记忆。

对外地游客来说,这或许是对网红打卡点的逃离,旅行将变得更

有趣而鲜活,契合着当代人对“体验感”“沉浸感”越来越高的追求,以及在精神文化领域日益高涨的消费热情。对于本地居民,城市将不仅仅是一处扁平的栖身之所,随着人与城市的羁绊不断加深,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知这座城市形象与温度,从归属感中获取支持和慰藉。而且在疫情背景下,原地旅行也是配合防控工作、满足休闲需求的好选择。

“漫步的轨迹在说话。”城市行走对城市发展也是难得契机。不需要大拆大建、强行布景,仅凭真实的风土人情,也能向人们讲述传奇,散发无穷魅力。

因此,面向人们的自发探索,城市不妨因势利导,提供最基本的便利条件。每个城市都可以打开思路,在做好各类景观修复、保护和开发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整合步行路线,以恰当的方式进行宣传。讲述城市另一面的故事,便是在帮助人们塑造着人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人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